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明清档案与 史地探微

郭美兰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清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明清档案与 史地探微

郭美兰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郭美兰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 / 郭美兰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 1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ISBN 978-7-5497-0263-3

I. ①明… II. ①郭… III. ①档案资料—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K248.0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9761号

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

MINGQINGDANGAN YU SHIDI TANWEI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印 张: 14

字 数: 400千字

插 页: 12

印 数: 1-2000

出版时间: 2012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李 璜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陈文本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263-3

定 价: 3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http://www.lnmzchs.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言

郭美兰论文集即将面世之际，作者嘱我写序。思之再三，本人与作者相识多年，不仅是清代边疆历史研究领域的同仁，而且她编译出版的有关清代边疆满文档案史料亦有助于深化本人的研究工作，实无理由推辞，只好应命，抽空拜读论文集，秉笔撰写以下感言，权充序言。

一

本论文集的作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前身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工作，至今已逾三十六载，其本职工作是从事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著录、编目、翻译，参加过内阁题本等多项满文档案的整理，《满文老档》《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等多种满汉文档案史料的编译，共计二十余种、百余册。特别是其中的满文档案，又以西藏与藏族、新疆与卫拉特蒙古档案为重点，而且多为独立编译完成，成绩斐然，为史学研究提供诸多第一手原始史料，意义非同一般。

有关西藏与藏族的档案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西藏与藏族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

有关新疆与卫拉特蒙古的档案有《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

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这两种满文档案史料的汉译出版，对研究清代卫拉特蒙古历史和蒙藏关系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在此着重介绍。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所辑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满文《夷使档》，原文影印，编译成3册出版，属首次公布。内容反映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1734—1754）间准噶尔部17次遣使赴京朝觐、纳贡、议和，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等。正如该书前言所讲，所有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者均深知，“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是清政府与噶尔丹策零大战额尔德尼召之后，举歼达瓦齐前与准噶尔和平交往时期，目前对这二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因资料有限，尚较模糊，论著对此段历史涉猎不多。满文《夷使档》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所记录的清政府与准噶尔贸易来往及和平交往等方面的内容，映现出清政府针对准噶尔部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准噶尔部对清王朝在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依赖关系”。所以，这部分满文原始档案的编译出版，无疑对清代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所辑档案，也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原文影印，编译成2册出版，属首次公布。满文《熬茶档》，内容反映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三年（1740—1748）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三次派使赴藏熬茶的过程。《熬茶档》因藏置深阁，加之能够使用满文档案原件的研究者无多，以往尚未被学界利用。因此，开发利用《熬茶档》，我们几乎可以拿档案内容还原在清廷视角中折射的历史原貌，无疑有助于推进清代准噶尔蒙古及西北、西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研究。

二

如作者自述，“档案馆不同于专门的研究机构，档案馆有特定

的日常工作，研究只能作为档案工作者的一种业余爱好”。让人们惊喜和钦佩的是，作者的这种“业余爱好”自 1985 年以来持续至今，为学界和读者奉献了近 50 篇论文和学术评述。

综观作者的研究内容，大体可归纳为如下特色：

一从内容看，主要围绕档案、边疆、民族及社会热点问题，而尤以卫拉特蒙古和新疆、北疆地区历史，西藏和藏族历史为主，也兼及清代宫廷史；

二从形式看，可分为史地探微、档案评述、随笔杂谈；

三从所利用史料看，大多以学界鲜见利用的满文档案为主，又兼及相关汉文档案和诸多文献。

上述三个方面的特色，从收入《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一书的 40 篇论文中可细加体察。在此本人只想从两篇研究评述卫拉特蒙古档案和历史的论文《清宫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和《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谈点读后感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本人即涉足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而土尔扈特历史是本人研究重点。研究之始，就已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汉满文档案，并邀集北京和新疆的满文专家着手整理和汉译有关卫拉特蒙古满文档案，于 1986 年编译出版《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本人由于参与相关学术工作，有机会细读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邦前后的满文档案，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撰写了《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安置》《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再论渥巴锡》《渥巴锡论——兼论清朝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以及《罗卜藏扎尔桑史事述叙》诸文，并收入本人与马汝珩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 至 18 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及与成崇德共同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两书之中。但是作为细读过汉译有关土尔扈特满文档案的研究者，深知土尔扈特满文档案中还蕴藏着更多尚不为今人所知的史实和历史细节，已出版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也有待大大补充其内容，故作者所撰两篇有关土尔扈特之

论文，读来格外有感触。

《清宫珍藏土尔扈特档案及其重要价值》一文中指出：“现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有关土尔扈特历史档案约有3800余件，绝大部分以满文书写，其时间起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止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述档案史料的价值，作者用如下三句话做了概括：“回归前的档案弥足珍贵”，“回归安置档案全面系统”，“回归后的档案数量颇巨”。同时，作者还坦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书的三点不足：“一是，辑录的档案数量少，仅为145件，与3800件的总量比较，触动的只是冰山的一角；二是，时间段短，仅收录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的档案；三是，收录档案种类单调，同一时期的起居注、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均未收录。”所言极是，可谓切中要害。当然，这些不足的出现，亦非我们当初之所愿，而是当时条件所限而不可为也，因此如作者所言：“要想深入研究土尔扈特历史，当务之急应加强档案的开发利用。”值得庆幸的是，当前有关土尔扈特满文档案的整理、汉译也有长足进步，而此项工作的实践者正是作者郭美兰和她的夫君吴元丰先生！

郭美兰不仅辛勤劳作埋首卫拉特蒙古满文档案的编译，还利用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即是一篇值得重视的力作。这篇文章对安置渥巴锡部众于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起因、经过及其意义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而这一内容正是本人当年论及同一论题时因资料不足而一笔带过之处。

关于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郭美兰还根据她长期的学术积累，撰写了多篇知识普及性文章，诸如：《迎着太阳回归的部族》《土尔扈特回归记》《东归英雄后人的述说》等。另外，我曾有幸与郭美兰一起参与承德避暑山庄策划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展”的学术策划工作，以及作为访谈专家参与大型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土尔扈特回归”一集的制作。

三

郭美兰学术生涯正值壮年，加之又有多年档案史料的积累，学术前程无可限量。综观其多年研究实践的经验，对有志于研究者的启迪，试做分析。

一是勤奋。郭美兰任职于档案馆，不同于工作在研究机构或高等院校者有可以相对灵活支配时间，一位天天上班的人，在长时间里或参与或主持完成多种满汉文档案文献的汉译和编选，又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多篇论文，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量！

勤奋出成绩，此为启迪之一。

二是实事求是。这里所讲的实事求是，是指研究切入点的选择要符合自己实际，方法上要符合学术规律。所谓研究切入点的选择要符合自己实际，是指郭美兰既熟练掌握满语文，又熟悉清代满文档案，能够轻车熟路的充分利用满文档案，独享天时地利之便。切又能抓住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西北边疆具有不同于他人的感性认识之利，将研究的切入点选择在充分利用未曾为研究者利用过的满文档案，研究新疆、西北和北部边疆，以及西藏和藏族历史。

所谓方法上要符合学术规律，是指无论在档案整理上还是研究展开上，既然是学术工作，那就严格遵循学术规律办事。如作者自己总结的她在从事档案整理编译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轨迹，即：参加初译或审校；独立完成选材、翻译、定稿；主持编译项目，负责选题、选材、翻译、定稿、排版。而她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大都也在掌握了档案内部的规律，了解档案反映的内容后，厚积薄发，才撰文加以介绍和评议。如《清宫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就是在查阅诸多满汉文档案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述论》等篇论文，均获益于编译有关西藏及藏族之档案。还有是在学术考察中注重当地古迹，以及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后在档案中寻找相关的原始记录，尤其是发挥自己通晓

满文的特长，在满文档案中发现线索，着力解决历史之谜，诸如《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二世哲布尊丹与多伦诺尔善因寺》等。

实事求是出成绩，此为启迪之二。

总之，勤奋与实事求是应是一切成功人士所以能成功的两大法宝，郭美兰以她自身的学术实践证明了这一朴素的真理，并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我虽虚长郭美兰二十来岁，但同在边疆历史研究这块沃土上耕耘了几十年，彼此不仅相识，而且是相知的，故在本文结束之时，还想提寄望两端：

其一，希望能译编更多的专题满文档案汇集。满文档案是边疆史、清史研究的资料宝库，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真正能熟练利用满文档案的中国学者毕竟还是少数。因此，这是一项有利于深化边疆史、清史研究的工作，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作。

其二，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力作问世。如前所述，正处研究者壮年的作者，在研究上既要发挥依托满汉文档案阐释历史的特色，也应有宏篇大论的研究筹划，我们有理由期待！

马大正

于北京自乐斋

2011年11月12日

前 言

从我离开地处西北边陲的察布查尔那片热土，第一次迈进北京故宫东华门的那一刻算起，时光已经过去了36年。36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是弹指一挥间，然对人生来讲，却接近生命历程的一半。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猛然间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招收锡伯族学生的消息，尽管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但出于对亲人的眷恋和家乡的挚爱，竟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报名，最后还是在亲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报了名，并与其他五位学生一同被录取。1975年7月27日这天，随着火车缓缓驶进北京站，我与明清档案的渊源由此开始，人生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初到故宫，我被分配到明清档案部的保管组见习，每天上下午都会到内阁大库查看温湿度并通风一次，从而有幸较早近距离地接触档案。每当进入灯光幽暗的档案库房，置身散发着纸墨味、成行成排的档案架中间，我都会感受到一种震撼，那就是历史的厚重、知识的浩瀚和个人的渺小，这种震撼，化作对知识的渴求和工作的热情，伴随至今，无所改变。

开办于1975年10月的“满文干部培训班”，根据明清档案的特点和对满文专业人才的需求，开设了“满文语音”“满文语法”“满文翻译”“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通史”“明清断代史”“清代档案”等针对性很强的专业课，还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今改为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三年之后，“满文干部培训班”成功培养了20位学员，我作为其中一员，以各门功课优秀的成绩回报老师的

培养和社会的厚爱，为今后开展明清档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刚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时候，明清档案部所保管的 1000 余万件档案分别存放于内阁大堂东侧的内阁大库、天安门东侧的皇史宬、太和门西侧的贞度门等多处地方。存放在内阁大库和皇史宬的档案，自 1925 年故宫文献馆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均已初步整理，码放还算整齐，而存放在贞度门等处的档案则不然，由于多属残破档案，且为各种条件所限，长期未曾加以清理，上面已积满了灰尘。这种状况，直到 1976 年位于故宫西华门北侧的档案馆新楼建成，随着一箱箱档案被搬进新楼上架，档案的保管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明清档案历经沧桑，其原有秩序和内在联系多被打乱，虽经几代人努力，完成了一定数量档案的整理工作，但相当数量的档案整理基础还是很薄弱，既不利于档案原件安全，也不利于永久性保管，进而无法开展修复、整理、著录编目、数字化、开发利用和编译出版等工作。让档案有章可循、有目可查，进而能够便捷利用档案，一直是明清档案工作者奋斗的目标。1980 年 4 月，原来的故宫明清档案部改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先后参加了档案馆开展的对内务府及军机处满文档案、内阁满文残题本、内务府汉文来文和说堂稿、端方档案等档案的整理工作，以及对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汉文录副奏折、内务府奏销档的著录工作。整理工作对档案工作者来说，是认识档案的一种基本途径，同时也是专业技术提高的过程，有幸参加以上提到的各项整理工作，确实获益匪浅。

档案馆的中心工作是保管、整理、编译。回顾我所做过的档案编译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参加初译或审校。最早的是 1978 年底开始的《满文老档》编译工作，继之又参加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编译工作。记得鉴于《满文老档》在学界的影响，从清末进士金梁组织翻译，到日本、台湾先后翻译出版，前人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因此故宫博物院大力支持和重视《满文老档》的编译工作，专门从中国社科院等多个单位邀请满文专家参加编译工作。第二阶段是独立完成选材、翻译、定稿。1986 年，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藏学中心合作，开始编译出版有关西藏和藏族的明清时期档案，我从原来所在的部门满文部抽调到研究室参加这一项目，负责满文档案部分，编译出版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等多部史料。第三阶段是主持编译项目，负责选题、选材、翻译、定稿、排版。自1998年研究室与编辑部合并为编研部后，除了参加或主持汉文档案编辑项目外，自行选题先后编译出版了《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等颇受学界欢迎的档案史料。

档案馆是座知识的宝库，人在其中，目光所及都是需要读懂的明清档案。多年来，我要求自己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提高。首先是在工作中摸索掌握档案内部的规律，了解档案反映的内容，探寻不同档案不同的价值，撰文加以介绍，如《清宫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就是在查阅诸多满汉文档案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其次是结合不同内容的编译项目，开展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研究，以编译项目为研究基础，通过研究提高业务水平，像《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述论》等篇论文，均获益于编译有关西藏及藏族之档案。再次是足迹所至，注重考察当地的古迹、历史事件及人物等，而后在档案中寻找相关的原始记录，发现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发挥自己掌握满文的特长，在满文档案中发现线索，解决历史之谜，诸如《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等篇，都是这样写成的。

档案馆不同于专门的研究机构，档案馆有特定的日常工作，研究只能作为档案工作者的一种业余爱好。我的这一爱好，追溯起来应始于1985年，是年第三届清史研讨会在长春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会论文是处女作《论兴安城总管衙门的兴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活动，也是第一次宣讲自己的文章，自此坚持写作20余年，围绕档案、边疆、民族及社会热点问题，已写有40余篇论文或文章。这些文章，由于刊登于不同的学术期刊或论文集，且刊载时间跨度大，早期发表的一些文章已很难寻找，所幸自己还有所保存，

故此借辽宁民族出版社鼎力相助，集结成册，出版发行。本书辑辑的文章，共有 42 篇，根据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分为档案评述、史地探微、随笔琐谈三部分，内容基本保持原貌，无大的改动。

本论文集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辽宁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吴昕阳的热情帮助，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先生欣然应邀赐序，在此一并致谢。

郭美兰

2011 年 11 月 6 日

目 录

档案评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朝档案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西藏历史满藏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7
清宫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	16
清代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满文奏折综析	44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与准噶尔史研究	57
沈阳故宫满汉文档案研究	67
清宫珍藏满文舆图	78
热河地图 清宫珍品	88
《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评述	93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	99

史地探微

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述论	108
六世班禅朝觐始末	121
六世班禅与须弥福寿之庙	140
乾隆三十六年中甸大宝寺争教命案原委	151
20 世纪 80 年代西藏历史研究概况	157
康熙年间口外行宫的兴建	172
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	191
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	202
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	213
雍和宫始建年代考	225

从清宫所藏满文档案看准噶尔蒙古赴藏熬茶活动	233
乾隆初期沈阳故宫修建考实	260
清代“塔里雅沁回子”东迁呼伦贝尔开垦种田始末	274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	285
清代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及其裁撤	304
论兴安城总管衙门的兴废	318
从地域特征看清政府对鄂伦春族统治政策的得失	327
嘉庆年间英国对澳门的两次入侵	338
清朝赏赐琉球国王及其来华使节制度初探	343

随笔琐谈

雍正继位	356
清宫奶茶钩沉	361
清代台湾 地震频发	366
清政府对住澳葡人商船的管理	370
康熙修建畅春园冰窖工程	372
清初震惊朝野的汤若望案	376
从《还珠格格》中的西藏王谈起	387
迎着太阳回归的部族	391
东归英雄后人的述说 ——简评《土尔扈特女儿》	403
锡伯族文化遗产	406
锡伯语口语音位系统	416

附 录

附录一：个人论著一览表	428
附录二：编译出版满汉文档案史料一览表	4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朝档案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3000 多件（册）明朝档案，尽管数量不多，但对研究明史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将这部分明朝档案的由来、内容及其价值略作概述。

一、明朝档案的由来

档案是历史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书，历代统治者对文书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明王朝也不例外。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总结建国后的立法定制和所作所为时说：“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制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明太祖实录》卷 14）明朝的文书档案制度相当完备，不仅有完整的文书处理制度，亦有严格的文书使用等级制度。皇帝专用的诏令文书，规定有诏、制、敕、册、谕、书、符、令、檄；臣工上奏的文书，规定有题、奏、启、表、笺、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说。各官府使用的文书，规定上行文书有咨呈，呈状、申状、牒呈、牒上；下行文书有照会、札付、下帖、故牒；平行文书有平咨、平关、平牒。

明朝档案历经劫难，损失极为严重。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朝档案，是清初为了撰修《明史》，清政府下令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各官府将有关文移开送礼部，然后再送内院，以备纂修。由于各衙门对此事督办不力，搜集工作成效甚微，故在修史过程中，仍感史料严重匮乏。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康熙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谕礼部征集明朝档案，并集中保存于清内阁大库中。这些明代档案与清朝档案一样，经过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权更迭，战乱破坏，损失相当严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先后将散失的内阁大库档案移交当时的故宫档案馆，3000多件（册）明朝档案才得以集中保管。总之，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朝档案，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饱经沧桑，今之有存，确非易事。

二、明朝档案的内容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明朝档案，最早是洪武四年的户帖、卖田契和永乐八年皇帝颁给“失家摄聂”喇嘛的敕谕。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弘治时期的档案基本无存；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时期的档案亦不多；万历时多为档簿，保存最多的是天启、崇祯两朝的档案，南明弘光时期的档案有2件。馆藏明朝档案在不同时代、不同单位进行过整理，基本是按朝年、文种分类排列，逐件（册）登记编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保管的方式，仍按其四个不同的来源分别存放。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旧藏明档。分折件和簿册两大类，起于永乐六年，止于崇祯十七年，共404件，有文献馆时期编制的《内阁明档目录》《明题行稿目录》《明选簿目录》。其中折件291件，多系兵部、礼部的题行稿、题稿、行稿，亦有少量的科抄奏本、启、咨、禀、呈、手本及实录抄稿等。其内容主要有：1. 内政类：礼部题稿多反映官员病故，家眷恤典，参奏祭祀太庙社稷不到官员，以及坛庙祭祀、修陵致祭等；兵部题行稿多反映武职官员的任免、升迁调补及休致、开缺、病故、阵亡，及官员的考选，议叙、褒奖、纠参等。2. 军务类：兵部题行稿反映核实边备、修筑边墙、设探放哨、募集兵勇、密调援兵、整饬驿站、筹办军饷、加强海防，以及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打陕西、山西、四川、湖南、湖北、河北、